

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,作为在管理和文化取向上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组织,确实应该与社会相融,但无论多么开放,它与社会之间终究是有边界的。

高校“校园游”能否一限了之

■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许悦

这个暑假,高校“校园游”再次受到公众的热捧,尤其是名校,比如北京大学东门口散客队伍时常排起百米长队。但是,校园游却带来了诸多问题,比如“黄牛”吆喝一百元就可排队带游客进北大,清华大学的标志性景观日晷一再遭到刻画等不文明对待。

鉴于游客接待力不足、校园环境遭破坏等诸多因素,不少高校都采取了限流措施,但这又引起了其是否应该开放的争论。

那么,高校校园游真的是一限了之吗?在这一热潮背后,又有怎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?

旅游热和教育热双重推动

在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看来,校园游热其实反映了高校与社会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。

“过去,大学在人们心目中只是象牙塔,现在已经由社会边缘变成了社会中心。”刘志业说,课程设置与社会接轨,在育人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民生,这是大学步入社会中心的一个表现;另一个表现就是大学与社会的边界高度降低,对社会各界越来越开放。

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凯则认为,校园游主要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两个“热”,一个是旅游热,另一个是教育热。

“暑假是旅游旺季,而一些高校本身就位于景区,校园里还有一些人文古迹,所以就会成为旅游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”侯定凯说,教育热会更加持久一些,因为对于孩子的培养,除了学校教育外,家长还希望他们通过校园游增长见识、拓宽视野,提供另一种成长空间。

“旅游热和教育热加起来,就使得校园游成为每年寒暑假不变的热门话题,让消费者趋之若鹜。”他说,而且现在无论是交通还是生活条件,都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对此,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瑞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。

“校园游热的背后是家长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期待,是中国家庭普遍对孩子教育、子女成才的高度重视。”他说,不仅仅是“不差钱”的家庭,不少家庭勒紧裤带也会报名让孩子出来参加高校校园游,希望能对他们的学业和发展起到激励作用。

校园游带来高校管理难题

对于公众追捧的高校校园游,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,它是大学向社会开放资源,参观者(主要是在读学生)了解大学、体验大学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,“但很显然,目前的校园游变为景点游,还为一些机构制造了商机”。

在他看来,校园游大致有三个层次:最低层次的是“到此一游”,走马观花,在标志性建筑、景观前拍照留影;稍高层次的是除了参观校园建筑、景观之外,还参观开放实验室、博物馆等,更深入地了解大学;而深度的校园游,则要在大学里学习生活一段时间,上课、做实验、听报告。

“目前,国内大学游和海外游学大多停留在”



图片来源:百度图片

第一层次,就是到大学里去参观,包括一些高收费的海外“名校游”,有的只是到大学校园里走一圈。“熊丙奇说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主要是因为社会存在旺盛的需求,商业机构看准了其中的商机。”但是,大学就是开放校园让游客参观接待不过来,更不用说开放实验室、博物馆,给学生作讲座、报告了。”

对此,张瑞鸿也表示赞同。“高校本身并不是一个景点,而是教学科研单位,它有自身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要求,不能简单把它看作完全开放的景点。”张瑞鸿说,大学具有开放性,比如图书馆、体育馆等公共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众开放,但大学也有其有限的容纳能力和脆弱性。

“我国的传统名校大多空间局促,跟国际上的很多知名大学相比,人多地少、空间拥挤,如果毫无底线地彻底对社会开放,那整个校园就会失去秩序,就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大学校园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。”他说,即便在暑假,大学教师也不会停止科研,很多学校都为学生开设了暑期课程。

对于张瑞鸿所说的有限容纳能力,有北大的一组数据为证:7月12日至7月31日,该校东部门散客登记入校人数日均2688人,并有大量儿童没有登记;东门团体预约入校日均3700余人;因校内培训、备课、会议等事宜入校近2000人,算下来,每天进入北大的访客平均约8000人。但是,北大用数学模型对校园环境承载力的估算是每天上限大约为5700人。

因此,面对庞大的校园游人流,高校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。比如北大分时段限流,每天7:30-11:30和14:00-17:00接待游客;再早些时候,中山大学推出“限外令”,严查入校的外来人员;武汉大学也从去年开始实行网络实名预约制度,限制入校参观人数,尤其是樱花盛开期间。

在熊丙奇看来,类似“限外令”这样的举措实在是无奈之举,“学生安全、财产安全、环境保护等都会存在一些隐患,高校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适当控制”。

被动变主动加强有序管理

面对校园游带来的管理难题,高校到底该如何解决呢?

熊丙奇认为,可以破除学校的围墙,把学校和社区打通,变学校为社区的一部分,实现两者的公共资源充分共享。“不过这一思路面临很大的现实阻力,高校管理者会担心一旦拆掉大学围墙,校园的宁静将被打破,安全问题会增多。”

“另外一个解决方式,就是在有围墙的情况下将大学作为一个景点(景区)进行开放。”他解释说,不妨将其建设为一个向社会开放的景区,增加景点接待、服务功能。其中,参观实验室、博物馆等也可作为体验项目。

“大学变为景区,不是说就要按景点收门票,这要由政府和高校在听取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共同决定。”熊丙奇补充道,一种是由政府拨款解决按景点开放的管理、维护费用,用一些公园免费开放一样;一种是学校按景点管理、维护费用准收成本费,也将其作为调控人流的一种方式;再就是根据景区的接待能力,实行网上预约制,并纳入规范管理。

在侯定凯看来,当前,高校还没有以积极的姿态去迎接社会人士的参观,仍旧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接受状态,“校园游带来的负面问题,与高”

校准备,组织工作不到位有很大关系”。

“在游客进入校园之前就告知注意事项,再由学校安排学生志愿者等专门人员带队参观,同时,这对本校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。”他举例道,还可以在校门口设置介绍校园景点的二维码,准备一些介绍校园的宣传印刷品,这样在参观时能更有针对性。同时,进入校门时,提示游客在参观校园中的安全事项和行为规范。

“总的来说,高校应该成为校园游的主动方,就像主人去接待客人一样,开发更多有教育意义的校园产品,而不是每每被动应付。”侯定凯说,特别是在人流量过大的情况下,有一些预案和准备很有必要,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和组织方面。

应正视大学与社会的界限

而在校园游的表象背后,高校的开放问题同样值得探讨。“因为,终究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原因而无法共享大学的资源,而组织良好的校园游正是我们展示开放办学理念的一个窗口。”侯定凯说。

“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,社会上的现象在大学里也都能看到,但在理念上,我们还是沿袭了一种相对比较封闭的思想。”他举例说,从对待校园游引发的一些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来,“总体来讲,我们高校对于处理与社会的矛盾关系,形成与社会良性的互动方面还缺乏准备。在校园开放方面,高校需要更多考虑如何利用自身优势,发挥其他社会机构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”。

对于侯定凯所说的封闭,刘志业认为,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建设还在初、中级阶段,校园中的生活与社会上的有所不同,各方面的资源配置也不平衡。“我们虽然国力日渐强大,但是在国民素质、环保意识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,无法一下子将这些全部弥补。同时,我国高校短时间内也无法做到与社区的完全融合,开放需要一个过程。”

“开放并不意味着敞开大门谁都可以进,这是肤浅的,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扩大对外交流、更新办学理念。”刘志业强调说。

在熊丙奇看来,大学校园的开放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“根据目前校园游的现实情况,在广泛听取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,政府和高校怎样进行校园开放的民主决策,建立开放的学校管理决策机制,才是大学最重要的‘开放’。”

而我国高校的开放程度不够,张瑞鸿认为,这是与高校在传统上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关而密切相关的,所有机关单位内外有别,不能彻底地对外部开放。“不过,大部分高校都是尽量地接纳游客,并安排相关事业,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高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。”

“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,作为在管理和文化取向上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组织,确实应该与社会相融,但无论多么开放,它与社会之间终究是有边界的。”他说,一方面大学要改变自身作为一个机关的习惯,能向公众开放的尽量向公众开放;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大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边界,社会公众也要包容大学维护自身教学和科研秩序所开展的校园管理。

中国大学评论

日前,《中国学生体质监测发展历程》报告出炉,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江崇民介绍,我国大学生体质依然呈下降趋势,只是下降速度趋缓。与此同时,大学生身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,尤其是肥胖率持续上升,每5年提高2%~3%。此外,2015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显示,7岁到19岁的学生体质状态,大学生下滑最严重。

针对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题,教育部体卫司负责人强调,高校应因地制宜制定健康教育教学计划,开设健康教育公共选修课,安排必要的课时,确定相应的学分。针对高校学生关注的健康问题,精选教学内容,吸引学生选修健康教育课程。

这和解决大学生其他问题的思路一样,大学生创业比例低,于是教育部门要求各高校开设创业教育,设立创业学分;大学生心理问题严重,于是教育部门要求各高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,将其作为必修课。可是,开设课程、设立学分就能解决大学生当前存在的问题吗?开课非但不能治本,就连标也治理不了。解决大学生存在的问题必须分析其根源,全面改革大学的教学管理和评价体系。

拿学生体质下滑来说,表面上看是大学生缺乏健康的作息习惯,因此,有必要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习惯。而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的途径之一,就是给他们上课、讲道理。可是,如果学生都不愿意去上课,包括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不去上时,开设选修课能带来多大的改变?能选这门课且去上的学生,可能是那些本来就有健康生活习惯的学生,他们重视学习、成长,对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感兴趣。

大学应该思考的是,怎样让那些整天躺在床上,作息完全颠倒的学生走下床,有积极的大学生活规划。这不是开一门课的问题,而是要通过严格的过程管理、评价,迫使生必须投入勤奋、努力的态度投入大学学习,而不是整天浑浑噩噩。一篇媒体报道举了两个例子:一个是:打一夜游戏或看一夜剧,王晨感到头疼、筋骨酸痛。研究生读了三年,王晨的胃不好,颈椎也时常不舒服,谁都知道这源于他的各种“作”——轻易不下床,饥一顿饱一顿,昼夜颠倒。另一个是:已经毕业的范普吐槽起他的“奇葩”室友:每天就是坐在床上玩游戏,看综艺节目,饿了点外卖、吃零食,一个月洗一次澡,不讲个人卫生,更别说宿舍卫生了……

对于这两个例子提到的大学生,学校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对他们有用吗?需要深思的是,这名研究生可以白天整天睡觉,晚上打游戏、看剧,难道他的导师没有给他布置学习任务,不让他去实验室做实验,或者参加研究活动?在美国大学读研究生的学生,都会有十分深刻的感受,就是整个研究生学习阶段,课程安排得特别紧,任务特别重也特别充实,哪有时间打游戏、追剧?就是晚上熬夜也是写论文、做案例。那位被吐槽的“奇葩”室友,每天坐在床上玩游戏、看综艺节目,这哪有一点大学生的样子?大学就可以这么轻轻松松地混吗?

对于大学上课,一直有不少学生吐槽,说老师上课枯燥没有意义。因此,大学里流行着“必修课选逃,选修课必逃”这样的说法。对于大学生逃课现象,大学也开始治理,比如要求教师严格点名,甚至有大学实行指纹打卡、“刷脸签到”。可是还是无法“吸引”学生走进教室。学生的态度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原因是,在当前重视学术研究的办学环境中,大学教师对教学并不投入,课堂教学缺乏创新,而且也不严格要求学生。在美国,包括社区学院和职业学院,教学质量都有较高的水准,原因在于,学校办学实行宽进严出,教师十分重视对学生的过程管理和评价。比如,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学一门课要完成几十个单元的实验,学生必须到实验室做实验;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学一门课老师要求必须读完10多本参考书,且参考书的内容、参与小规模的研讨课、研讨课的表现都作为课程评价的一部分。试问,如果我国大学也有这样的教学安排、设计、管理、评价,学生还可以整天待在床上吗?

可以说,很多大学生的懒散作风,与他们进大学之后学校实行的学生管理和评价制度有密切关系。假如一进学校,大学就明确告诉学生将实行严格的淘汰,强调教育质量;而且教师严格要求,课程难度大,学生为完成课程学习任务都“刻苦连天”,他们会变得颓废、迷失吗?有一位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学生说,他们的学习生活可以这样说,“只要学校选得好,年年像高考”,大学的学习节奏就如国内高三。如何让所有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张、充实起来,这是我国大学面对学生的懒散状态,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健康教育学分能解决大学生体质下滑?

■冰后

现场

若尔有梦 盖力虔行

——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若尔盖支教侧记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
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……”在支教队员的带领下,《诗经·木瓜》不再是摇头晃脑的课文朗诵,而是像古人一样以歌声吟唱出来。讲台下,调皮的男生笑场了,片刻后也大胆地吟诵起来,结尾处还故意拖了一个尾音。

吟诵风格随意,讲读未成曲调先有情,找到最能打动自己的吟诵调。而这也像极了首都师范大学若尔盖支教的风格。7年前,首届若尔盖支教团成员来到四川省若尔盖县藏文中学,从此,每届支教团便将这份深情埋在了广袤的大草原上,身未动,心已至。

正如首都师大党委书记郑粤的评价:“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是用一段假期的时间,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”。派出社会实践团是为引导广大研究生走进基层、深入群众、亲身实践、挖掘‘真经’,不断夯实‘为学为师、求真求实’的能力与本领,更是为培养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,更好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。”

把最好的学生派来了

“成都就要到了,请各位旅客准备下车。”火车广播将支教团的思绪从七年前拉回了2017年7月。

七年间,乘坐同一趟列车往返于京川支教,若尔盖支教团副队长王利强笑称:“K117是若尔盖支教团的‘专列’”。

卸下了近30个小时的疲惫,他们于第三日行车10个小时,来到了海拔3440米的若尔盖藏文中学。

对于藏文中学的认知,存在于往届支教的师兄、师姐的叮叮万嘱中——整个县城只有10辆出租车,学校没有校车无法迎接;学校在搞建设“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”,没有一盏路灯,没有开水房、浴室、卫生间……一切需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尽管如此,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若尔

盖——包括指导教师高超,19名队员在内全部自愿报名参加,队员选拔经历笔试、面试、体检,从近三百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。

支教队员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文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院系19名研究生。用藏文中学校长尼玛俄热的话说:“首都师大把最好的学生派到了若尔盖。”

藏文中学共有2500名师生,一线教师仅120名。由于条件不好,常年缺编。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所到之处,满是钢筋、石灰。在尼玛俄热的努力下,教学楼、校舍在敲打声中动工,但一盖就是7年,至今仍未完工。

听说首都师大支教团来了,小县城沸腾起来。于是,支教团初来若尔盖的一个晚上,便有了这样一幕——队员被藏族出租车司机拦住了两次,在“惊魂未定”之下,得知原来司机只是想要送孩子来上课,却被以讹传讹误以为要收800元学费。“我们免费上课,赶紧送你家孩子来补课吧!”支教队员“笑响点亮了四面风”。

夜空中最亮的星

忙碌的一天开始了。早上7点是尼玛俄热制定的“国学”时间,雷打不动。在他看来,国学不仅能够提高道德水准,也有助于藏族学生了解汉文化。

支教团到来之后,带领学生们诵读、吟诵、诠释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等国学经典,成了队员们每天“必修的功课”。

课上,队员韩佳宁告诉记者:“别看学生们一起喊的时候很起劲,单独提问时就显得生涩、羞怯。”

如何获得自信是应试之外的能力。因此,除了补习高考的九门科目,书法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也列入其中。支教团还通过“圆梦大讲堂”,为学生讲“一带一路”与中国外交、最后的舞者、感恩师生情、遇见五年后的自己,以此来激励他们大胆前行。每班每天10节课,满当当的教学之余,队员

们还在若尔盖县机关各处挂职锻炼,发起“圆梦计划”为学生筹集助学金,组织红色若尔盖党日活动等。

其中,“圆梦银行”计划从2012年起,通过众筹、出售自制明信片等方式,已给当地278名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10万余元。

而最能考验他们与学生亲密度的,莫过于家访。由于天色已晚,路途遥远,支教团本打算放弃前往学生当州家,班主任辛晴看出了他的难处,坚持按原计划前行。到达当州家时已经夕阳西下,只见一个半月形湖泊镶嵌在草地上。当晚,所有队员留宿在当州家20平方米的小屋里,第一次尝试打地铺,而这已是当地人最高规格的接待了。

“我最喜欢辛晴老师了,她上课严肃认真,一下课就变成另一个人,幽默、喜欢开玩笑,跟我们没有距离。”当州展露了草原大男孩的直率。

从刚开始几天去菜市场买菜被宰,到后来去餐馆老板主动打折。不知不觉中,若尔盖支教团成为了若尔盖夜空中最亮的星。

“这是我们来若尔盖的意义”

若尔盖,藏文的意思是“耗牛喜欢的地方”。这里蓝天与草地相接,牧牛人信马由缰,姑娘、小伙子能歌善舞,被称为“中国最美的高寒湿地草原”“云端天堂”。

然而,这里一年中9个月下雪,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,藏文中学却创造了90%的高考升学率。这其中,有校长矢志教育、毕业生返校任教的情怀,也少不了支教团的功劳。



支教队员给孩子们上课。

尹旭摄

“我是艺术教师,不能帮助他们在高考中得分,一开始我并不确定自己能为他们做什么?直到去年临走的时候,一名唱歌很好、不敢在人前表现的男生找到我说,因为我们的到来,在音乐课试唱时他找到了自我。我想,这就是我们若尔盖的意义。”第二次参加若尔盖支教的队长曹百媚深有感触。

然而,支教团不仅传道授业,也是传递藏文化的“信使”。在尼玛俄热的带领下,他们前往达扎寺,了解到寺院也是一座大学,也有天文系、医学系、哲学系;参观藏文中学创始人罗让尼玛蜡像,学习了民族教育家的精神。

去年,尼玛俄热受邀前往首都师大,在总结大会上他潸然泪下。后来,他将首都师大支教团的精神总结为三点:“第一热爱母校,第二尊重教师,第三也是最关键的,一届届的传承精神。”

事实上,如若尔盖支教团一样,将首都师大精神、将口号“若尔有梦,盖力虔行”践行到底的不只是一支团队。据首都师大党委副书记缪翔介绍,今年首都师大共有6支队伍、100余名优秀学生骨干开展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。同学们走出象牙塔,深入基层,在实践中检验、磨炼和提升自己。内蒙古牙克石、甘肃会宁、甘肃河西走廊、四川雅安、河北平山也同有着实践团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首都师大精神。